大学应该如何张扬学术权力？

秦丹

今日论语

现代大学，怎能成为官场而不是大师荟萃之地？公众对大学学术权力弱化、泛行政化的意见由来已久，伴随着去行政化的呼声，各种对高校大学精神不再的批判声时击耳鼓。教育部将于3月1日实施《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其中的各项措施，意欲通过相对分离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提振大学学术风气。

而今的大学，甚至有一个普通行政人员将一个老教授训得哑口无言的例子，这样的情形，假若当年的蔡元培校长、陈寅恪等一辈大师得见，不知作何感想？教授的尊严，源于学术的尊严。但现实中，一些大学的大小领导，不仅行政权力加身，还同时将学术权力把玩于掌中，因此才会有一些身披官袍的学阀、学霸，左右高校学术“市面”，在这种情形下，高校的学术风气怎么可能清正？

遥想当年，学者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即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就是大师。汲汲于名利，左手行政权力、右手学术权力的凡夫俗子充斥高校，何来大师清风？不能淡泊名利，又怎么可能心怀学术之远景？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必须分离，学术权力的相对独立是大学精神得以发展的基础。由此改良大学土壤，吸引优秀人才，锻造一流大师，才可能有一流的学术水平。

张扬学术权力，并不代表不尊重行政权力，而是要充分认识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各自特性，正确行使这两种权力，从而让二者成为支持大学发展的两股坚实力量。从学校发展的长远看，教授治学和校长治校本不该矛盾。制度设计首先要充分尊重学术权力的权威性、民主性、松散性。高校往往有一些干部，自身的素质并不高，领导力不强，加上学术自主的意识不强，难以协调各方面的学术力量，又要武断专行，治校结果可想而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干部，往往让公众和教授们在某种程度上轻视高校行政力量的作用，从而忽视行政力量强制性、系统性、时效性下的管理和服务效能。若要让两种力量都有较好的平衡发展，就必须让这两种力量相互尊重和监督。教育部即将颁布实施的《规程》，正是通过制度力量来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和配合。

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分离，能有效遏制学术腐败。从本质而言，学界在讨论中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分离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因此，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大学内部，有关管理部门僵化的思想和低下的行政素质，也是那一只需要遏制的“行政权力”之手。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尤其让行政权力不再能攫取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也不再站在学术的梯子上攫取行政权力，才可能真正避免学术腐败。

新民随笔

黑社会的外衣

沈月明

以对所谓“白道”的渗透而言，四川刘汉黑社会组织近年罕有其匹。如果没有当前高层反腐倡廉、打黑除恶的坚定意志，很难想象滋繁二十年，已经坐大“洗白”的刘氏兄弟还有束手就范的一天。

对普通人来说，黑社会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有一天知道一个认识的人被“黑帮”（当地人对黑恶势力的称呼）砍断了手筋，我才确信这个“特殊群体”在不远处的真实存在。最近一次听说他们的活动，是一个朋友的孩子居然被“黑帮”堵在校门口不让上学，原因是其家人赌博借了高利贷逾期不还。后来这件事靠圈子里的“大哥”调停解决。而这件事对我最大的震撼，是朋友以坚定的口吻说“报警没用”。

第二次的见闻，虽然没有了血腥味，但其对人心理上造成的恐怖更甚于前者。这有点像刘汉黑社会的“进阶路线”。前期通过杀人、威吓赤裸裸地从农民、商人手中抢夺财富，然后通过拉拢行贿跻身官商圈子，后期洗白身份，甚至光环加身（如刘汉的四川省政协常委、刘维的奥运火炬手身份），这时，他们攫取商业利益，只需要一张名片，甚至一个眼神了。

所以打击黑社会，除了掀掉他们头顶上的保护伞，还要特别注意辨清“变形”后的真面目。对普通人而言，要看清黑社会的和善外衣。

黑社会的“高阶”形态往往是对“黄毒赌”、商业领域的无形控制，所以与正常人的生活鲜有交集。在普通人面前，他们可以做到衣冠楚楚、礼貌谦和，甚至援手贫弱。据媒体报道，刘汉到后期亦关注慈善，“见人就撒钱”，其出资建造的刘汉希望小学在汶川大地震中因坚立不倒而广受赞誉。

对黑帮成员人性的吊诡之处美国电影《低俗小说》曾有描述：杀人如麻的打手居然圣经不离口，黑吃黑的马仔在不知情的女友面前是个痴情小伙，大哥的心腹果然对其有情有义。但黑社会的和善外衣无法抹却他们手上的血迹，以及对公众利益的严重侵害。所以刘汉团伙覆灭，舆论为之鼓舞，也释放出更多期待。

新民新语

带着父母去远游

乐梦融

父亲上山下乡时的老友在纽约抱恙，父母冒出一个想法，去美国看看他。

旅行社提供的保姆行程1天赶10个景点，导游是个放羊娃，起早摸黑，定点喂食，还得频繁点数。父母甚少出过远门，看到ABC就会涌起焦虑，不选自由行又不达目的。我说，走，我一起去。

不论经济开销，就是叫我暂搁手头的繁忙工作，还要“抛”妻“弃”子。朋友们说，这么搭配有点稀奇。

恰好前几日，纽约东部飞雪漫天，前行深深浅浅，从箱子翻出一顶米老鼠绒线帽，戴在60多岁的父亲头上，却也合适。我不识路，但手机里有离线地图，找个地址毫无难度。“找得到么？不会迷路吧？”也许是自责无力，也许是埋怨我没有提前告知，每经过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要抛出疑惑来，得到肯定的回答，这才心安。

忽然想到，儿时曾随父母去一个市郊，隐约记得寻不到地址，问不到行人，胆小怕迷路，我也是这么问个不停，甚至还会胡乱思想，会不会饿死在这里？父亲只说，有爸爸在。

“现在上海几点了？”每每餐馆落座，母亲戴上老花眼镜对表，没名堂地算时差，我不耐烦地报出时间后，母亲赌气道：“懂一点算术有什么稀奇！”我心里一下子就惭愧了——“现在几点了”这样的蠢问题，谁小时候不是一天问上十遍八遍的？

儿子牙牙学语，能背上《弟子规》开篇：“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遣词造句都有画外音，有理更有情。古人的规矩看似严苛，实则遮掩着一份家庭的暖意。

与父母同游的平安康乐，尽享天福，论述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只是回忆像一部忠诚的相机，在美国街头拉着父母漫行，清冷的夜色中但无所求，只想沿着大街一直走下去，“不知怎么样才好，只觉爱惜之不尽。”

孔子云，父母在，不远游，说要在父母跟前尽心侍奉，最好别出门，出门要把家里安排好，以尽孝道。索性，趁着父母还有一段走得动、看得清、吃得香的好年华，一起出一次远门，成就人生有情有味的回忆。

其实，这很奢侈很奢侈。

“办证焦虑”呼唤政府转型

权威声音

一名中国居民，一生要办103个证件。近日，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拿出一张3.8米的“人在证(征)途”，展示中国居民从生到死的办证之旅。

这103个证件中，多数都有合理性。但是乍一听，103个证，也太多了！加上群众对“办证难”的固有印象，就勾起了群体性的共同焦虑。细细分析，群众的不满不仅在于办证多，更在于办证难。

办证有多难？不妨举个例子。近日，河北省卫生计生委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一对夫妻办“准生证”的过程：花16天，跑8个单位，开5份证明，盖8个章，才办下这1个证。要是每个证都这么办，那每个人都至少得花5年在办证上。

“办证焦虑”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类似的“办证难”经历能引起共鸣。

办证难，一些难是必要的，比如身份证、房产证的办理，手续多要求严，是为了保护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了提高安全性，势必要牺牲一定的便利。但是政府可以在“能改的难”上下大力气。短期见效，应从窗口着手改作风，不让老百姓跑冤枉路、受窝囊气。去年以来，公安部出台措施：一趟能办完的不让跑两趟，手续不全的要一次性书面告知，对困难群众主动上门服务，刁难群众的一律停职。整改措施效果相当不错。若能固化为长效机制，百姓势必拍手称快。其他部门也不妨借鉴。长期治本，呼唤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干部们首先就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归服务者的本色与本位。（蒋云龙 全文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一年等一回

春节后，许多回乡过年的年轻人背上行囊返城打工，而家里的老人则寂寞地留守空巢，翻着墙上厚厚的日历，期待来年春节的再次团圆。 孙绍波 画

自由谭

惠灵顿公学带来的焦虑

汪大观

仿佛一夜之间，国际名校开始在中国“凶猛”生长。诺丁汉大学、纽约大学等著名高校已不算新奇，更多的国外高中开始加入抢滩大陆的行列。不久前，“上海发布”称，英国惠灵顿公学在上海的国际学校将于今年8月开始招生，并且它还只限招收外籍人士以及港澳台人士的子女，每年学费在20万-25万元人民币。

新生事物总易引发人们的热情议论，但这远非国际学校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行动。早在2011年，惠灵顿公学就在天津建立了分校。一个更著名的案例是哈罗公学北京分校，2014年，它还将入驻成都。

上述学校由英国惠灵顿公学与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显然体现了上海的战略意图——在原世博园区建设这样一所国际学校，既能盘活世博资产，更有助于吸引国际人士和国际企业落户上海。对于上海市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很划算的经济账。这一项目还将招商引资升级到了“招商引智”的水平，这与上海发展“总部经济”及建设“四个中心”的战略也是相联动的。

并不是只有上海热衷此事。2013年12月3日，随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英外交部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为这所学校揭了牌，学校的中心大楼正是以其名字命名的。考虑到英国的校友传统，上海分校的学生们可能在未来为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上海带来更多资源。

然而，这也只是经济账而已。公众对这条新闻的评论体现的却是另一种情绪——焦虑。坦率地讲，类似的国际学校比许多公立学校的条件要好得多。乍一看这所国际学校的建筑效果图，人们首先想到的形容词，一定会是“高大上”。可能有部分家长会想，这么好的学校我的孩子上不了怎么办？为什么公立的学校没有这么好？为什么上好的公立学校这么难？

必须承认，这是上海乃至全国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其本质是做大教育产业和做好公共教育服务之间的悖论。尽管国家和上海在义务教务、公共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但一所具有标本意义的国际学校，还是对社会普遍关切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挑战。设若有一天，当这些国际学校不再只招收国际学生，更开始招收本土学生的时候，我们的高中和大学要如何吸引学生报考，又如何解决民众用脚投票的问题呢？事实上，如何提升中国的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如何更加合理分配公共教育资源，以教育促进阶层流通，促进社会公正，这才是真正困扰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

惠灵顿公学上海分校只是一所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私立国际学校，它无疑是上海教育产业的翘楚，体现了上海改革的决心。但在一个更广阔的图景中，它则成为一面照出社会焦虑的镜子。对于中国的教育，大家多少，是有些焦虑症的吧？